

中國文獻辨偽學新思考 ——從傳統文化角度審視

劉重來

[摘要] 中國典籍文獻浩如煙海，但從古至今，偽書偽文層出不窮。面對市場經濟大潮中偽書偽文的猖獗，本文從中國傳統文化角度審視這一現象，認為中國文獻辨偽學必須與時俱進，其研究領域應更加開放，研究視野應更加廣闊，研究方法應更加科學，從而預期中國文獻辨偽學任重道遠、大有可為之前景。

[關鍵詞] 中國文獻辨偽學 新思考

1999年，我在《歷史研究》第6期發表了《中國二十世紀文獻辨偽學述略》一文。^①文章結尾處我就說：“中國文獻辨偽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說它古老，是因為它有悠久的歷史；說它年輕，一是因為它作為學科體系，其構建時間並不長；二是隨着新資料新方法的問世，還有大量長期懸而未決的真偽問題等待去鑒別；三是偽書偽文還在不斷出現，且以更隱蔽、更狡猾的手法欺騙世人。”可以說，中國的偽書偽文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偽造時間之早，偽造手段之巧，蒙蔽世人之久，均可稱得上是“世界之最”。此非我故出驚人之語，實際上古今學者胡應麟、姚際恒、張之洞、梁啟超、顧頡剛等早就有此慨歎。明代辨偽大家胡應麟在其《四部正譌》中說：“余讀秦漢諸古書，核其偽幾十七焉。”晚清張之洞在其《輶軒語》中也有感歎：“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兩人所言，均非危言聳聽。因為自古以來，偽書偽文層出不窮，不僅已定性的偽書偽文多，而尚待辨明真偽的典籍文獻則更多。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有位叫曹養吾的學者，寫了一篇《辨偽學史》，開篇就對偽書偽文之多大發感慨：

梁任公先生講古書之真偽及其年代，開頭便說：“……文化發達愈久，好古的心愈強，代遠年湮，自然有許多後人偽造古書以應當時的需要。這種情形，各國都有，尤其是在中國，造假的本領特別發達！……”的確，中國是有悠久的歷史的，亦可說文化發達頗早的；但是，同樣，我們中國人是特別好古的，特別會造假的。你看我們耳目所及的古書中，真能說是真書的到底有多少？噯！真是所謂偽書充斥，黑白難分！你看無論哪種學問，總有許多偽書——經有經的偽書，史有史

^① 此文收入《〈歷史研究〉五十年論文選》（20世紀中國歷史學回顧·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790—812頁。

書,佛學有佛學的偽書,文學有文學的偽書;真是多極了!真是多極了。^①

這連續兩聲“真是多極了”十分形象地表達了曹養吾對中國偽書偽文之多的驚歎。而更可怕的是,在當今市場經濟大潮中,某些人見利忘義,致使假冒偽劣成災,什麼假廣告、假文憑、假證件、假古董、假牌照、山寨版、假煙假酒、假藥假錢、假球假唱等等鋪天蓋地,而偽書偽文也不甘寂寞,且以空前猖獗之勢滾滾而來,以致有人發出了“盛世危言”：“偽書猛於虎。”揭示了當今偽書偽文猖獗橫行之狀^②。

一、“偽書猛於虎”

“偽書猛於虎”並非危言聳聽,也非嘩眾取寵,更非故意炒作,而是實實在在,有目共睹的事實。

如今製造偽書偽文,無論是造偽的數量,造偽的隊伍,造偽的手段,造偽的規模,造偽的渠道,都是古代造偽者望塵莫及、自歎弗如的。古代製造偽書,常常是躲在陰暗角落偷偷摸摸行事。而如今則不然,製造偽書偽文不但不避嫌,甚至堂而皇之陳列在各大書店的暢銷書架上^③。這種造偽之勢已遠遠超出了個人行為,而是由小集團,甚至是某些出版社與書商“合作”製造偽書。早在 2004 年,就有知內情的人揭發這種明目張膽的造偽行為:

兩年來出版界爭做“偽書”之風日盛。假作者、假授權、假推薦、假發行量……祇有想不到,沒有假不到。……“偽書”走到今天,無論技術手段還是作假路數,也益發呈現出多樣化和複雜化的趨勢。有一些“高級偽書”甚至做到滴水不漏無懈可擊,讓一些規範操作的出版機構無可奈何,一些傳統“名社”、“大社”也參與到此類書的出版,使得欺騙性更大……“偽書”的橫行與氾濫,暴露出出版界的一些問題,也許會像假球一樣,毀掉整個市場。^④

如今造偽的特點之一是:每當某位作者的作品走俏暢銷,假冒其作者的偽書就隨之出現,甚至蜂湧而至。當年林語堂的著作暢銷海內外,於是托其名的偽作紛起,特別是臺灣,其偽作尤多^⑤。著名作家葉永烈的書十分暢銷,於是冒他的名字出的偽書則如“雨後春筍”。僅葉永烈本人就發現冒其名的偽書達 50 種以上。為此,他還寫了一篇題為《冒用我的名字

① 轉引自鄭良樹:《古籍辨偽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第10頁。

② 韓曉東:《盛世危言:“偽書”猛於虎——“偽書”橫行憂思錄》,《中華讀書報》2004年12月1日。

③ 《偽書在我市書店熱銷》,《重慶時報》2005年4月25日。

④ 韓曉東:《盛世危言:“偽書”猛於虎——“偽書”橫行憂思錄》,《中華讀書報》2004年12月1日。

⑤ 伍立楊:《風格辨偽》,《檢察日報》2003年5月23日。

的偽書多達 50 種》的文章^①。文章裏不僅開列了這 50 種偽書的書名，而且開列了出這些偽書的“出版社”名。僅 2003 年一年，他就發現假冒自己的名字出版的偽書達 22 種之多，連以出書多而快的葉永烈本人也感歎“遠遠超過我自己出書速度”。

著名作家賈平凹的著作暢銷海內外，特別是《廢都》一出，引起不小的轟動，於是“一股搭乘《廢都》餘熱，假冒賈平凹姓名出書的歪風狼煙四起，先是署名‘老賈’的《帝京》，繼之為署名‘賈平凹’的《霓裳》、《世界不能沒有女人》、《廢城》、《慾城》、《裸城》”等等^②，讓賈平凹為此大感頭痛，不得不為此請律師，打官司。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莫言早在 10 多年前就被冒他的名字出的各種偽書搞得苦不堪言。如 2002 年他在北京一家書店發現了兩本冒用他的名字出的偽書：一本是《大別山下的男女》，一本是《小城夜話》。之前他還發現冒用自己的名字出的《歲月情殤》、《擁抱激情》兩部偽書，他不得不向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舉報中心投訴，並聘請律師想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不想律師却感到十分為難：“本案操作起來很難，祇能是從圖書的經銷商入手，但找不到進貨渠道，更查不到印刷者。”舉證困難，官司難打。莫言祇好借助媒體發表聲明以正視聽。耐人尋味的是，聲明的標題竟是《軟弱的聲明》^③。可見在偽書偽文猖獗面前，個人是多麼軟弱和無力。而葉永烈面對那麼多冒他的名字出的偽書也感到十分無奈。他說：

冒名書嚴重侵犯了我的著作權、名譽權。但是，我在明處，盜版書商躲在暗處，“冤無頭，債無主”；倘若到法院起訴，則不知被告在何處。^④

如今的偽書，以假亂真的程度，連古人也望塵莫及。葉永烈發現假冒他的名字出的一些偽書，印製之精美，裝潢之華麗，讓他感慨萬端：

通常的偽書，大都粗製濫造。然而，在 2003 年毛澤東 110 周年誕辰紀念前夕，我發現一本印得相當精緻、上下兩卷的《毛澤東一生家世》，冒用我的名字出版。這兩卷書還繞着一根“腰帶”，上面居然也印著“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周年”字樣！書中還附有許多毛澤東的照片。這本印製精美的偽書，欺騙性更大，居然堂而皇之進入一些書店銷售，我甚至還在網上見到銷售。^⑤

一些造偽者，還把手伸向了港澳和臺灣。如香港著名作家金庸一共只寫了 15 部武俠小

① 葉永烈：《冒用我的名字的偽書多達 50 種》，載《華麗轉身》，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 年，第 550—558 頁。

② 王轍：《偽作〈霓裳〉》，載《一部奇書的命運——賈平凹〈廢都〉沉浮》，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11 年，第 77 頁。

③ 莫言：《求助法律是最後手段》，《檢察日報》2003 年 4 月 4 日。

④ 葉永烈：《冒用我的名字的偽書多達 50 種》，載《華麗轉身》，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 年，第 555 頁。

⑤ 葉永烈：《冒用我的名字的偽書多達 50 種》，載《華麗轉身》，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 年，第 553 頁。

說,但冒用他的名字出的偽書竟多達 100 多種^①。又如臺灣著名作家瓊瑤的小說,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風行大陸,但不久之後,一部部託名瓊瑤的偽書就出現了,甚至將一些黃色下流的書也署上瓊瑤的名字,給瓊瑤的聲譽帶來極大傷害,身心帶來極大痛苦。1988 年,她第一次來大陸,就遇到了這類頭痛事。為此,她說了一段令人傷心,也令人憤怒的話:

我在北京十二天,絕大多數的日子都很快樂。知道我的小說,在大陸每本銷售量都高達七八十萬冊,對我來說,簡直是個“震撼”,我的歡樂實在涵蓋了版權問題……但是,當有一天,有位讀者拿了一本我的假書來,那本書名叫《噴泉》,冒我的名而出版,我當時就情緒低落了。接着,又有《風裏百合》、《忘憂草》等假書出現,等到有本《蛇女》拿到我面前來時,我真的不會笑了,因為,那本冒我的名字出版的《蛇女》,完全是一本下流的黃書!我翻了一翻,心裏難受極了,第一次瞭解到“版權”的重要性。一個臺灣作家,如何能在大陸受到起碼的保護?這實在是個太大的問題!我如何去告訴大陸上的廣大讀者,某些書不是我的“原著”,這是更大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時,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快樂。^②

瓊瑤的這番傷痛之言,使我們深深感受到偽書對作者的巨大傷害。

更出人意料的是,如今有些出版機構,竟將製造偽書之手伸向了國外圖書,偽造所謂“引進版”圖書。這些造偽者一旦發現國外某書暢銷,就搬用或仿冒該書名,假造一本,再署上國外某知名作家之名,在中國內地堂而皇之出版發行。如 2002 年延邊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一本叫《一分鐘的你自己》的書,署名作者是曾大紅大紫的《誰動了我的嫵酪》作者斯賓塞·約翰遜。果然書出後大為暢銷,一年內竟發行了幾十萬冊。當時就有人寫文章《弄虛作假!還暢銷!誰來管》予以揭露^③。然而偽造所謂“引進版”圖書之風越演越烈,連續又出了《沒有任何藉口》、《培養男子漢》、《西點法則》、《沃爾瑪王朝——從優秀到卓越的經營之道》、《麥肯錫卓越工作法》、《執行力》等所謂“引進版”書。這些偽書居然通過正常渠道銷售,且十分暢銷。2005 年 4 月 25 日《重慶時報》曾以《偽書在市書店熱銷》為題報導了《沃爾瑪王朝——從優秀到卓越的經營之道》、《沒有任何藉口》、《執行力》等偽書在重慶各大書店、書城熱銷之“盛況”^④。

二、造偽者衆多

雖說中國古代偽書偽文不少,但造偽者畢竟多是個人行爲,且涉及的階層並不廣,人也

① 轉引自劉重來:《近年偽書三則》,《博覽群書》1992 年第 3 期。

② 瓊瑤:《剪不斷的鄉愁——大陸行》,轉引自劉重來:《近年偽書三則》,《博覽群書》1992 年第 3 期。

③ 韓曉東:《盛世危言:“偽書”猛於虎——“偽書”橫行憂思錄》,《中華讀書報》2004 年 12 月 1 日。

④ 羅強等:《偽書是怎樣“煉成”的》,《重慶時報》2005 年 4 月 25 日。

不多。而如今則不同了，參與制造偽書偽文者各階層的人都有。從研究生到導師，從教授、院士到校長到各級官員，無一不有。君不見，如今對一部書或一篇論文沒有寫過一個字，却憑藉領導和導師的權勢，大言不慚署上第一作者姓名，這種怪現象，已成了“潛規則”，早已不足為奇了。

特別是如今官員提升講求學歷學位，於是在職官員中突然間冒出了許多碩士、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曾在“2009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上指出：“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並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①。而且這些博士中，大多數是先戴上官帽再戴上博士帽的。在職官員拿博士學位，已成近年官場的一大時髦，而他們的學術論文、學術專著也隨之滾滾而“出”，這在中國已是司空見慣了，但外國人却大惑不解。一位“在中國待了七八年，相對較深入瞭解中國社會”的日本學者加藤嘉一道出了自己的質疑：

中國為何有那麼多博士官員？我認識的許多高官都有博士學位。但他們在讀期間依然忙著當官、開會、應酬，不怎麼上課，也似乎不怎麼具備寫學術論文的專業能力和得到博士學位的文化素質。他們使勁兒利用官本位的傳統慣例，通過發揮官員本身的身份優勢向教育機構提供政治優惠等方式換取學位。我懷疑，難道中國的博士學位真的那麼便宜嗎？在日本，這種做法絕對行不通，若有這樣的政治家和官員，就會被媒體曝光，並永遠失去身份，所有政府機構也務必在陽光下面臨來自司法和輿論的雙重審判。^②

可以想像，在中國，這些“似乎不怎麼具備寫學術論文的專業能力和得到博士學位的文化素質”的官員們，是如何“寫”出一部部學術專著和一篇篇學術論文的。這些年一些官員的學術專著或學位論文或憑權力請人代筆，或在別人的著作上簽上自己的名字，或乾脆去抄襲等醜行不斷被曝光，中國官員因要戴上博士、碩士帽子而在不斷“出籠”偽書偽文已是不爭之事實。

古人作偽，或是因懼怕封建專制統治下嚴酷的文字獄，不得不埋名隱姓，假託古人而作偽；或因出於尊古、求名、爭勝而作偽，雖然各有難言之隱，各有善惡不同的動機，但起碼有一點應該承認，那就是這些造偽者中的不少人，確確實實是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如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的三國魏人王肅，就是公認的大學問家。而今天的一些造偽者，不少都是不學無術但專會投機取巧的人。

古代製造偽書偽文，畢竟是見不得人的勾當，祇能偷偷摸摸。而今天却不然，造偽不但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廣而告之”，唯恐別人不知道。君不見，大學校園裏，常有公開張貼

① 湯勁松，《最大的博士群體為何在官場》，《重慶時報》2009年10月28日。

② [日]加藤嘉一，《唐駿學歷造假們的冷思考》，《書摘》2011年第11期。

的“代寫論文”的廣告，並保證能公開在某級學術刊物上發表，明碼實價，清清楚楚。其明目張膽，令人咋舌。據某位學者專題研究顯示，僅 2009 年一年，我國論文買賣的銷售額已近 10 億元^①，這其中包含了多少偽文，祇有天曉得。

造偽的另一特點是抄襲現象盛行，特別是互聯網出現後，抄襲更方便，更肆無忌憚。這些年，被曝光的“文抄公”，不僅有大學生、研究生，而且有教授、博導、院士、官員。如某大學副校長陸某為自己的學生的一篇學術論文得以發表，未寫一個字，却在第一作者上署名，由於該論文被證實是抄襲，才真相大白。有人反問，如果此文並非抄襲，完全是他的學生所撰寫，而陸某却署上自己的名字，此事恐怕永遠不會被曝光，但對陸某來說，仍難逃製造偽文的良心譴責^②。

如今抄襲現象已到了可怕的地步。2006 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公佈了一個調查報告，在被調查的 180 名博士學位獲得者中，竟有 60% 的人承認抄襲過他人的學術成果^③。

說來說去，如今造偽的動機，純粹是爲了“名利”。早在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就說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古今對照，如出一轍，祇不過如今更明目張膽罷了。

三、從傳統文化視角窺探

辨偽學家姚際恆在《古今偽書考序》中說：“造偽書者，古今代出其人，故偽書滋多於世。”那麼從古自今，中國的偽書偽文爲什麼會層出不窮，爲什麼在數量之多、範圍之廣、手段之巧，蒙蔽世人之久等等會有那麼多的“世界之最”呢？爲什麼在歷史上稍有“適宜的氣候”便會滋生那麼多的偽書偽文呢？除了歷代學者總結的“造偽”原因，如尊古、爭勝、射利、嫁禍、誹謗、自恥、借重、好事、求名、誤題等外^④，還有出於冠冕堂皇的各種原因，如爲宣傳革命而偽造《太平天國詩文鈔》，後柳亞子承認“世所傳石達開詩什九是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爲鼓吹革命時假造以供激發民氣之用的”，這也證實了一個事實：“太平天國文獻贗品之多，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清末一些宣傳革命的人偽託太平天國文獻來作鼓吹革命之用”^⑤。而康有爲“爲了達到他政治改革的目的，他把古籍辨偽學當作魚肉，任意刀俎，古文經如古文《尚書》、《周禮》、《逸禮》、《毛詩》及《左傳》等等，無不是劉歆偽造依託的。甚至於《史記》、《漢書》中凡有關古文經傳的記載，也都是劉歆附益和篡改的”^⑥。而上個世紀 70 年代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個別工作人員偽造《坎曼爾詩箋》的動機是想表明“新疆是

① 石敬濤：《10 億元論文買賣拉動了什麼“內需”》，《重慶時報》2010 年 1 月 6 日。

② 湯勁松：《比抄襲更醜陋背後的潛規則》，《重慶時報》2009 年 6 月 17 日。

③ 宋趙來：《學術腐敗：動搖中國的發展根基》，《書摘》2010 年第 8 期。

④ 楊燕起等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第 329—330 頁。

⑤ 羅爾綱：《〈太平天國詩文鈔〉訂偽》，載《太平天國史料辨偽集》，北京：三聯書店，1955 年，第 126 頁。

⑥ 鄭良樹：《續偽書通考》(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4 年，第 20 頁。

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不為個人名利的作偽”^①。盡管有這種種“愛國”、“無私”的動機，但假的就是假的，偽裝仍應剝去。

對於上述疑問，除了這種就事論事的回答外，我們是否還應從更高更廣的角度如從文化傳統的角度來思考呢。原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周少川說：“將中華典籍的產生發展、流傳整理置於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從而開闊了視野，啓迪了智慧，使我們對於文化傳統與典籍發展之間相互影響的規律有了清醒的認識。”^②此話很有見地。不久前，著名學者余秋雨的一段話深深吸引了我，他說：

我們國家，長期注重是非判斷、好壞判斷，而輕視真偽判斷。其實，真偽判斷是一切的基礎。真偽的界限不確定，是非界限和好壞界限就很不可靠。^③

無獨有偶，仍是那位在中國待了十多年的日本學者加藤嘉一也發出類似的感慨：

衆所周知，中國公民對真與假的敏感度、判別與監督的意識和能力是極低的，也不怎麼當回事兒。許多博士學位可以用權或錢買到，已經畢業的學生可以做假證繼續到處享受學生優惠，至於那些家電、科技產品、衣服、食品、圖書、光盤等造假現象無處不在。不管是造假者還是使用者，服務者還是消費者，大家作為合格公民的權利意識極為薄弱。^④

余秋雨和加藤嘉一的話顯然不是針對典籍文獻辨偽而言，但對文獻辨偽學却有很大啓示。中國對典籍文獻的研究源遠流長，但可以說，絕大多數研究都是在典籍文獻的功過是非、褒貶好壞上下功夫，却常常忽略了典籍文獻本身是真是偽。應該說，“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歷代學者研究典籍文獻的優良傳統，但千百年來，這“辨章”也好，“考鏡”也好，都把功夫下在典籍文獻的功過是非和褒貶好壞上，下在其傳、注、箋、疏、正義、訓詁、闡發微言大義上。從“五經”到“七經”，從“九經”到“十二經”再到“十三經”，把儒家學說逐漸神聖化，經典化，却恰恰忽略了典籍文獻本身的真偽。這就是為什麼一些偽書偽文，長期蒙蔽世人而未被揭穿的原因之一。如《古文尚書》被東晉梅賾獻上後，不少學者視如珍寶，頂禮膜拜，被列入學官，置博士。唐代大學者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時，還選中了它，以後又被編入《十三經注疏》和《四庫全書》之中。由於歷代學者的推崇和皇帝的欽定，竟使這部偽書成了科舉、學校必讀之經典。可以說，是做足了對它功過是非好壞的評價，却單單忽略了對其本身是真

① 楊鐘：《〈坎曼爾詩箋〉辨偽》，《文學評論》1991年第3期。

② 周少川：《中華典籍與傳統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頁。

③ 余秋雨：《霜冷長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第377頁。

④ [日]加藤嘉一：《唐駿學歷造假們的冷思考》，《書摘》2011年第11期。

是偽的審視，以致這部假冒的經典竟哄騙世人達 1300 多年之久。清初閻若璩以幾十年的心血寫成《尚書古文疏證》，才使聳立在輝煌金塔上的《古文尚書》轟然崩塌。否則，還不知哄騙世人到幾時。梁啟超認為閻若璩對《古文尚書》的辨偽，“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①，可見辨偽在整個封建社會該有多難，特別是對經典的辨偽，又要有多麼大的勇氣和魄力。辨偽之艱難，由此可見。

但我們不禁要問，面對層出不窮，甚至猖獗一時的偽書偽文，為什麼辨其真偽却如此艱難，如此軟弱無力，勢單力薄？仍然是余秋雨的一段話讓人怦然心動：

中國文化幾千年，嚴重缺少“辨偽機制”。進入近代之後，又未曾像西方一樣經歷實證主義的全民訓練，因此這個弊病一直沒有克服。……幾百萬、幾千萬的數字（指“文革”中的冤假錯案），整整十年（指“文革”十年）的時間，難道真是什麼領導人在控制一切嗎？不可能。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酷愛謠言的群體心理，是聞風而動的鬥爭哲學，是大假不懲的法律缺失，是無力辨偽的文化傳統^②。

雖然余秋雨的這番話是針對“文革”而非典籍文獻而言，但面對中國自古及今偽書偽文層出不窮，愈演愈烈而辨偽却軟弱無力的現狀，却使人有茅塞頓開之感。就以“酷愛謠言的群體心理”來說，也並非空穴來風。君不見十幾年前一位姓張的作者寫了一本名為《心香淚酒祭吳宓》的書（廣州出版社 1999 年版），作者再三聲明此書是他“以心香之誠、淚酒之悲，紀其實而存其真”，“所記全是親見親聞的事實”，“唯有秉筆直書，才能反映原事原貌”。然而經衆多有識之士閱讀後才發現此書“多向壁虛造，穿鑿附會，虛構了一個吳先生”^③，認為此書“不具有學術討論或文學評論的性質，而完全是一個揭偽打假的問題，該書從頭到尾全是胡編亂造”，“應該用對待別的偽劣產品一樣的方法處理”^④。然而奇怪的是，此書被揭穿虛構造假之後，反而銷量大增，供不應求。這種現象，有學者認為：“作偽者之所以能在一定範圍，一定時間得逞，是利用了讀者爭奇驚怪的心理。這種心理相當普遍地存在，可以說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⑤。

說到“大假不懲的法律缺失”，盡管如今偽書偽文猖獗橫行，但却罕見誰會因為製造一本偽書一篇偽文而受到法律制裁。關於真假問題，不妨聽聽日本學者是怎么說的：

在日本，造假事件或現象沒那麼多，至少不到中國的萬分之一。日本的產權、

①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載《中國歷史研究法》（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94 頁。

② 余秋雨：《何謂文化》，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 年，第 145 頁。

③ 唐振常：《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論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之誣》，《文匯讀書週報》1997 年 6 月 21 日。

④ 周國平：《一本欺世盜名的偽劣書——評〈心香淚酒祭吳宓〉》，《文藝報》1997 年 11 月 29 日。

⑤ 陳漱渝：《存真求實，去偽辟謬——試談回憶錄的鑒別》，《中外詩歌研究》，2008 年第 2 期。

歸屬、真假關係比較明確，一個產品、一個品牌、一個人物的真實性和科學性出現問題，務必遭受來自輿論和法律强有力的雙重壓力和反擊。剛開始由媒體挖掘並預熱，最終由司法來解決，這是日本社會處理“真或假”的普遍規律。對於明星或公眾人物，社會的積極反應和嚴格要求就更加明顯。^①

說到中國“嚴重缺少‘辨偽機制’”，可以追溯到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宗法制度，這種由血親宗法制度派生出來的社會心理，其突出表現是對祖先的絕對崇拜和對傳統的極端尊崇。表現在文化上，實際上就是強權文化，這種文化壓抑了人的獨立思考，壓抑了人的創新思維和懷疑精神。在對待典籍文獻的心態上則表現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及尊古卑今、迷信經典、迷信權威、迷信聖賢。而作偽者恰恰利用了人們的這種心理，打着經典、聖賢、權威的旗號製造偽書偽文。誠如梁啟超所言：“偽書者，其書全部分或一部分純屬後人偽作而以託諸古人也。例如現存之《本草》號稱神農作，《素問內經》號稱黃帝作，《周禮》號稱周公作，《六韜》、《陰符》號稱太公作，《管子》號稱管子作。”^②這種作偽心態與今天把一些偽書硬栽在林語堂、金庸、莫言、賈平凹、葉永烈、瓊瑤等人身上，是一脈相承的。可見這種迷信聖賢、迷信權威、迷信經典的文化傳統，既讓造偽者有機可乘，又給辨偽者造成很大障礙。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嚴重缺少‘辨偽機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學者認為“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容易產生謊言的體制”，而其中“第一個大謊言就是君權神授，所有下面的謊言都是從這個根上來的”^③。有這樣的“謊言體制”，那麼“中國文化幾千年，嚴重缺少‘辨偽機制’”就不難解釋了。

必須指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精華，也有糟粕。既有尊古、信古、迷信聖賢經典之傳統，自然也有“疑古”、“尊疑”、“惑經”之傳統。眾所周知，懷疑精神是促使學者獨立思考、努力探索，不迷信經典權威，不因循守舊的動力。回顧中國學術文化發展史，就不難發現，舉凡理論的突破，方法的創新，領域的開拓，特別是典籍文獻真偽的鑒別，往往都是從懷疑開始的。在中國文獻辨偽史上，懷疑精神更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能對已司空見慣，或被權威定性的典籍文獻持懷疑態度，而不是輕信和盲從。懷疑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之一^④。但不能不說，幾千年延續的中國學術文化發展史上，尊古卑今、迷信經典、迷信權威、迷信聖賢和中國歷史上從“焚書坑儒”到“獨尊儒術”到大興“文字獄”等以強權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畢竟是強大的主旋律，“疑古”、“尊疑”、“惑經”等懷疑精神和批判態度根本抵不住這股強大的主流。在這種“無力辨偽的文化傳統”下，為了釋疑，為了辨偽而求實證之風始終無法深入下去，更不用說“像西方一樣經歷實證主義的全民訓練”了。因而偽書偽文一直層

① [日]加藤嘉一：《唐駿學歷造假們的冷思考》，《書摘》2011年第11期。

②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9頁。

③ 吳思、胡糾糾：《謊言的成本和收益》，《書摘》2011年第11期。

④ 參見劉重來：《為了歷史的真實——談談史疑在史學發展中的作用》，《光明日報》1999年2月21日。

出不窮,甚至在某一個時期達到“風起雲湧”之勢,形成一個個高潮期。

古代如此,近代也一樣。就如上個世紀 70 年代初“發現”的,曾轟動一時的《坎曼爾詩箋》來說,它本是一件偽造十分拙劣的贗品,但一經史學大師郭沫若寫下《〈坎曼爾詩箋〉試探》(《文物》1972 年第 2 期),鑒定其為唐代真品,甚至把所謂唐代西域人坎曼爾手抄的《賣炭翁》評價為“新樂府存世最古的抄件”,“真可稱為無價之寶”後,這件本不起眼的贗品頓時大紅大紫、身價百倍,以後 20 多年,“舉凡涉及唐詩、民族文學、民族團結的書籍、辭典,幾乎無一不為其撥出適當的篇幅,予以弘揚”。甚至還將《坎曼爾詩箋》選入中小學課本,讓千百萬青少年對這一偽作誦讀學習^①。可以說,這件偽作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似乎又製造了一項新的“世界之最”。但細細想來,這場鬧劇之所以能延續 20 多年,仍是迷信權威、輕視真偽判斷的心理在作祟。

四、文獻辨偽學應與時俱進

周少川在《文獻傳承與史學研究》中強調:“文獻學的發展是與社會發展、社會的歷史文化發展密切相連的。”^②面對市場經濟大潮中偽書偽文的猖獗,文獻辨偽學的研究也必須與時俱進:其研究領域應更加開放,研究視野應更加廣闊,研究方法應更加科學。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朱傑人在評論臺灣學者林慶彰的《偽書與禁書》一書時說:

《偽書與禁書》討論和研究的是當代的偽書與禁書問題,似乎不在“歷史文獻學”或“古典文獻學”研究的範疇之內。但是,今天的現實就是明天的歷史,現實倒映著歷史的影子。……時代的發展、科技的發展,已經迫使我們必須根據新的學術發展作出適應性的發展——這是我們不能不作出的一種回應。如果你不回應,那你只能被邊緣化;如果你不能回應,那你就只能被淘汰出局。^③

朱傑人還強調,“當前層出不窮的各色各樣的大出版工程,如果有文獻學家的介入,就可以避免很多垃圾出版物”;“如果没有林先生的前移介入對臺灣當代禁、偽書的研究與考辨,一百年後,文學家、經學家也許會為一個‘甘志清’爭吵上幾年十幾年”^④。此論可謂為遠見卓識,如果今天的歷史文獻學、文獻辨偽學不及時對當今的偽書偽文給予關注、研究,幾

① 楊鐸:《〈坎曼爾詩箋〉辨偽》,《文學評論》1991 年第 3 期。

② 周少川:《文獻傳承與史學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15 頁。

③ 朱傑人:《林慶彰著〈偽書與禁書〉評議及其他》,載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編《典籍·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 34 屆年會論文集(1)》,2013 年,第 138—149 頁。

④ 朱傑人:《林慶彰著〈偽書與禁書〉評議及其他》,載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編《典籍·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 34 屆年會論文集(1)》,2013 年,第 141 頁。“甘志清”乃臺灣某出版社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翻印大陸史學家呂思勉的著作時,為避禍而將呂思勉的名字改寫為“甘志清”。

十年幾百年後再來辨偽，恐怕就難上加難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學者一方面認為歷史文獻“包括了古往今來的所有著作和所有文獻”，又認為“辨偽，就是運用相關的知識與方法考辨歷史文獻中的偽書偽文”，但一方面却又把辨偽學界定在一個十分狹窄的範圍內：“辨偽學，是關於古書辨偽的系統的知識理論與方法”^①，這前後不免形成了悖論。既然連被譽為“當今臺灣學界辨偽學大師”的林慶彰尚且將文獻辨偽研究的範圍擴大到現代的偽書偽文上，並寫出了頗有影響的《偽書與禁書》專著，我們又何必非要把辨偽學的研究領域僅僅界定在“古書”這一狹窄的範圍內呢？在楊燕起等主編的《中國歷史文獻學》一書中，我參與編寫了其中《辨偽學》一章，我提出了辨偽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之辨偽，“舉凡有真偽問題，並且有考察鑒別價值的事與物，均在辨偽之列”；而狹義之辨偽，“則專指考察鑒別典籍文獻的真偽”^②，這自然包括了古今所有的典籍文獻，而不只是“古書”。

當然，對於今天的文獻辨偽學來說，把重點研究的對象仍放在古代的偽書偽文上，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古代典籍文獻因時間的久遠，代代的“層累”增添，人為的改竄和重塑，都給辨偽造成極大難度，因而必須以極大的耐心和毅力進行反復研究論證。鄭良樹根據自己辨偽研究對象而將其辨偽著作定名為《古籍辨偽學》，倒是十分貼切的。

我在《中國二十世紀文獻辨偽學述略》一文結尾處，曾引用了《呂氏春秋·慎行·疑似》中一段話：“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幹者……相似之物，此患者之所以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疑似之跡，不可不察。”正視中國歷來“輕視真偽判斷”、“嚴重缺少‘辨偽機制’”、“無力辨偽的文化傳統”等等弊端，發揚懷疑精神和科學精神，不迷信權威，不迷信經典，即使偽書偽文製造得再巧妙，也終會原形畢露的。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發現”的所謂《孫武兵法》82篇，曾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還經所謂專家組的“鑒定”，甚至被學苑出版社以《孫武子全書》為名正式出版，但最終還是被揭穿為一部贗品^③。因此，對古往今來的所有典籍文獻，祇要有“疑似之跡”，就“不可不察”。

中國文獻辨偽學任重道遠，大有可為。

（劉重來，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教授）

① 黃愛平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頁、第111頁。

② 楊燕起等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318頁。

③ 《《孫武兵法》82篇純屬偽造》，《文匯讀書週報》，1996年12月21日。